促进上海成长型企业 发展壮大体制机制研究

李旭东¹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0003)

【摘要】: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部门为促进成长型企业发展而制定的系统配套的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上海应以成长型企业的迫切需求为抓手,以投融资、税收为重点,从构建政策机制体制入手,从创业培训、投融资服务、科技创新扶植、咨询信息服务、市场拓展服务、税收优惠服务、法律制度服务等角度分析政策机制体制,并构建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机制体制系统。

【关键词】:成长型企业 公共政策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6.4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10-0024-010

一、上海成长型企业的特征和面临的挑战

(一)成长型企业的行业特征

上海成长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截至2015年底,上海第一、二、三产业中的中小企业数量占比分别是0.43%、23.64%和75.93%,其中在第一产业占比比上年下降0.28%,在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比上年增长1.17%和2.84%。不同行业的成长型企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工业成长型企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平均每家企业的从业人员高于其他行业,但总体从业人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营业收入和规模变动幅度不大。在细分行业中,医药和汽车行业的成长情况较好。第三产业的成长型企业普遍存在实收资本下降的问题。近年来,营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业、租赁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及科研及技术服务业的增长也较快。

在新兴行业和模式方面,上海成长型企业与深圳、北京等城市相比,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互联网创新相对落后,缺少类似腾讯、阿里巴巴的顶级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创业氛围和环境都存在缺陷。

二是技术型创新不足,上海许多创新企业的创新点主要是商业模式,缺少以技术产品为主打的企业,专利申请方面也不如深

¹**基金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专项课题(编号2017-R-004-B)。

作者简介:李旭东,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

圳。模式型创新容易被复制,形成以价格战为主的激烈竞争,最后能否突围而出依赖于背后的资本,且模式型创新往往难以实现盈利。

三是文化等“软实力”的色彩较浓,这是上海的一大优势,上海的创业企业里有以二次元文化为主打的哔哩哔哩网站和争相涌现的众多网红餐厅,其中哔哩哔哩网站已形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社会意义甚至超过商业意义。在当前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上海特有的“小资”文化对年轻人和中产阶层的吸引力很强,有利于打造文艺、轻奢的特色消费模式,如果能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将开拓出一片广阔的市场。

(二)上海成长型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

1. 融资渠道不足,融资成本高。从资产结构看,成长型企业获取债务融资的难度较高,结合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滞后的现状,成长型企业在成立初期面临较大的现金流困境,这可能是成长型企业保持较高的流动资产比例的原因之一。现金流和融资问题同样会阻碍企业投入研发或是进行产品升级,且很有可能导致企业在创业阶段的死亡。成长型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是外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且上海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显现,成长型企业自身的特性也决定了其普遍面临融资难、市场拓展难、规模效应小、人才成本高等问题。

二是上海所特有的因素,包括政府服务效率、扶持力度等。一方面,政府所提供的投融资服务不能满足企业需求,上海所提供的投融资服务主要包括各类免费培训和社会服务资源对接,社会服务资源包括各类贷款、征信服务、保险服务、投融资业务、双创板挂牌等,企业的融资成本没有实质性降低,部分融资顾问、法律顾问、挂牌服务费用高昂,成长型企业难以负担;另一方面,各类服务供给不足,上海企业服务云所提供的投融资社会服务资源对接项目总共只有47项,与高达数十万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匹配,这与企业服务平台上线时间较短也有关系。

2. 税费负担重。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税负和社保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国整体宏观税负约30%,而社保负担在部分地区达到工资额的40%~50%。上海近年来在减税降费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但是,上海对成长型企业的优惠政策与国家政策相比,并没有在优惠力度上更进一步,减税降费政策的实际效果有限。

同时,区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没有同步,部分区没有把优惠政策落地。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不是独立运行,受到多方面约束,区镇层面的服务机构职能也已弱化,更加大了政策落地的难度。由于政策执行不统一、服务机构职能不强,造成政策体系较为碎片化,企业难以了解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服务和监管机构也不太了解企业的生存发展状况。

3. 人力等运营成本较高。上海是中国人力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这无疑给本身资金薄弱的成长型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随着未来的产业向着高技术含量、高人力投入的方向发展,人力成本对成长型企业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同时,上海的房价上涨对人力成本上升也有推动作用,但成长型企业很少能通过投资房地产来获得房价上升红利、抵消房价上升的负面影响,反而是实力较强的大中型企业获得了较大的房价红利。

4. 市场拓展困难。上海大中型企业在成长速度、融资渠道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而其中国有企业占比又较高,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压缩了成长型企业的市场空间和生产要素来源,间接提高了运营成本。上海对新兴业务和产品的监管较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成长型企业通过创新业务开拓市场。

5. 商务服务业不发达。成长型企业在创业阶段所需的创业指导、运营咨询、人力资源服务等价格较高且供给较少,企业成长缺乏专业指引,容易因经营不善而出现问题。

6. 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转化保护机制不完善。创新对成长型企业至关重要,其中既包括内部创新,也包括引进外部成果,目前

的知识产权定价、交易、转化等机制还存在缺陷,阻碍了创新成果产业化。解决以上问题,需要从融资机制、国有企业改革、房地产市场改革、扶持机制等多方面入手,而其中见效最快、与成长型企业最为相关的,则是融资机制。

为成长型企业提供更丰富有效的融资渠道,不仅可以直接缓解成长型企业的现金流和运营成本难题,更可以使其获得充足的发展基金,从而能够有更多研发投入和市场推广支出。此外,合理的融资机制可以筛选出成长性强、潜力巨大的优质企业,对这些企业进行专业培育和扶持,有利于减少试错成本,加快产业转型和经济新动能形成。

二、政府支持成长型企业机制体制的理论体系分析

(一)支持成长型企业机制体制的内涵和类型

1. 支持成长型企业机制体制的内涵。从性质上看,支持成长型企业体制机制属于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现代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概念之一,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虽然各国学者的定义都反映了机制体制的以下内涵:一是机制体制的主体是政府和其他国家权威机构、政党及其他具有法定权威性的公共部门。二是机制体制是一个行为过程。表现为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是时间、制度、文化、资源等因素影响下的集合体。三是机制体制的功能是非私人物品的权威性搜集、整合、分配方案,分配服务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

2. 支持成长型企业机制体制的类型。根据政府政策对成长型企业的介入和影响程度,可将支持企业发展机制体制划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以及政府—市场平衡型体制机制。

(1) 市场主导型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英国、加拿大也可归入这种模式。该模式十分推崇市场自由竞争对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基本推动作用,虽然也主张对成长型企业采取必要的扶持政策,但这种扶持政策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通过限制市场垄断和解除制约成长型企业的法规与体制因素来维护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

这种模式对成长型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采用法律、法规和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一般不会介入具体企业的管理、运营事务。其主要政策主张有:禁止过分垄断,减少大企业成长型企业的吞并;保护成长型企业的经济活动领域不受侵犯;在金融上保证成长型企业的资金供应;在技术、教育和管理上指导成长型企业,提高其素质。

(2) 政府主导型模式刚好与市场主导型政策相反,十分强调政府主导的机制体制对于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政府主导型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该政策具有3个重要特点:一是有严谨和规范的计划和产业政策以指导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并通过行政指导说服成长型企业服从政府的意志。二是有详尽、复杂的成长型企业法律、法规体系,要求成长型企业严格自律、依法行事。三是通过控制或管制社会资源诱使成长型企业服从政府的指挥。

(3) 政府—市场平衡型模式介于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政策之间,既肯定市场机制对于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认可政府对成长型企业的重要推动作用。该政策的典型代表国家为德国、法国、意大利。在政策特点上,它强调市场竞争与政府控制相结合、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与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相结合,特别重视中介机构对成长型企业的协调、监督与服务作用,通过中介机构引导成长型企业的行为,从而间接地管理成长型企业。

由此可见,成长型企业政策模式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来选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模式往往有着较大差别。这说明,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及时认识成长型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正确的成长型企业政策模式,对于制定可行而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就上海目前的实际情况,从中长期看,成长型企业应选择政府—市场平衡型模式,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是一个时间较长的系统工程,是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中,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二是上海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交叉性的政策模式,不能拘泥于某一种统一的成长型企业体制机制。三是科技创新企业不断发展,在全球信息化智能化浪潮席卷下,科技创新型企业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对于这些科技创新型企业,既要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引导,同时也要有适度的政府干预,保护其存在与发展。

(二)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原则和框架

1.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原则。(1)法律规范、政策引导的原则。政府运用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方式支持成长型企业的体制机制是首选的原则,一般采用引导、激励、保护、协调、促进等具体方式进行规范和引导。例如,发达国家都有知识产权保护法规,维护创新者的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要素能自由流动和及时获得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的成长型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分配激励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符合成长型企业特点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支持成长型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应加快成长型企业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加大立法力度,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为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社会经济环境。

(2)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同成熟企业相比,成长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属弱势群体,因此在制定成长型企业创新政策时,主要应关注以下内容:成长型企业具有平等地获得技术的机会,具有获得各种信息和其他创新资源的权利;为成长型企业营造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的环境;成长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取的成果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成长型企业与成熟企业之间的平衡。

(3)分类指导的原则。成长型企业千差万别,成长型企业的经营活动领域几乎无所不包,存在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而且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成长型企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重点也不同。为此,体制机制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确定哪些方面更应该得到支持。所以,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有针对性,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普遍地扶持成长型企业,更不能去扶持那些不需要支持的浪费资源的企业。

分类指导的原则是指在支持成长型企业时不能不加区别,套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应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选取政策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分类指导原则避免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因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也为各种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奠定基础。

(4)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相结合的原则。直接支持体制机制是指直接作用于成长型企业经营活动的措施,即国家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直接鼓励、支持一些技术和企业的发展,引导企业健康发展。间接支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体制机制措施不直接介入成长型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只是为其创造条件,如对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和专利保护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等;二是指体制机制虽然有许多计划直接针对成长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但多数计划并不由政府直接操作,而是由非营利性的中介机构(如基金会、投资公司等)来实施。

在通常情况下,直接支持的作用强度要大于间接支持,作用速度也快于间接支持,但不利因素是容易增加成长型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且机制体制措施的实施也难以体现平等原则。同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政府对一些产业或企业的直接支持,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或反对。间接支持虽然在作用强度和作用速度上不如直接支持,但却可以减少政府对成长型企业的直接干预,更有利于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也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5)支持消极和不保护落后的原则。国外的成长型企业政策常常可以用很形象的两句话来概括:一要少干预,多支持;二要帮助自助。前者的意思是要求对企业内部事务不要干预,要支持;后者的意见是指要扶植那些自己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企业,即扶持那些有自我发展动力的企业,不扶持那些躺在别人身上的企业。一般做法是进行“开发性”扶持,不搞“救济性扶贫”,不向濒临

倒闭的亏损企业打“强心针”。

(6)与经济发展趋势及宏观政策协调一致的原则。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必须置身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进行考虑,因此应将国家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以及目前既定的成长型企业机制作为完善成长型企业政策的依据。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应特别注意成长型企业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相协调。

(7)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由于自身的技术、生产设备以及意识上的限制,成长型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成长型企业)在生产中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一个共性问题。实践证明,成长型企业如果不处理好环境问题,不仅会影响和污染环境,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客观地说,这一问题在我国相当严重,如何将环境优化与企业共存、社会进步和发展与企业对利润的追逐联系起来,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或者宣传上,而应该转化为针对成长型企业政策中具体可行的措施。

2.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框架。体制机制是指政策诸要素、环节的有秩序(一定关系)的集合体,也即是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因此,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机制体制简单地讲就是指成长型企业政策诸要素的集合体,是政府或其他公共权力部门为了促进成长型企业的发展而制定的系统配套的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它由成长型企业政策理念、成长型企业政策主体、成长型企业政策客体(对象)及成长型企业政策措施等构成。支持成长型企业政策理念是制定成长型企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引导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它体现了成长型企业体制机制主体所要实现的目标。成长型企业政策主体,即成长型企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者,也就是说,成长型企业政策主体分为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成长型企业政策客体指成长型企业政策的适用范围,即成长型企业政策作用对象。成长型企业政策措施是指实施的具体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的法律支持措施、组织支持措施、金融政策措施、财税政策措施、技术政策措施、产业扶持措施、社会化服务措施(人力资源、信息服务、出口促进、中介组织建设)等。

根据我国目前成长型企业发展阶段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我国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应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进行设计。需要说明的是,各项政策措施对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影响并不局限于对各自目标的作用,常常出现的情况是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这也是政策措施系统性的表现。

在具体内容上,主要由法律支持、金融支持、财税支持、产业与技术支持、社会化服务(包括信息支持体系、人力资源支持体系、中介服务体系)等内容组成。各政策措施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成长型企业的法律机制体制支持,包括为成长型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及规范成长型企业发展秩序、促进成长型企业技术创新等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成长型企业金融机制体制支持,包括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政府、资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成长型企业金融机构,以及二板市场、产权交易、发行企业债券等在内的成长型企业资金融通体系和信用保证体系。

三是成长型企业财税体制机制支持,包括推进成长型企业发展以及减少成长型企业社会负担的成长型企业财政、税收政策体系。四是产业与技术体制机制扶持,包括创业支持政策、工业园区政策、产业集群政策、产业组织政策等。成长型企业技术扶持政策:包括成长型企业产品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在内的、以企业自身为主体、政府扶持为催化剂的成长型企业创新体系。五是成长型企业社会化服务政策,包括成长型企业信息化服务、人力资源培训辅导、社团互助、中介服务等体系。

三、上海成长型企业机制体制支持体系实践分析与建议

(一)结合上海战略和国家政策的宏观体制机制建设探索

1. 鼓励成长型企业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担保、典当、小额贷款公司等融资性服务机构；鼓励成长型企业开展为金融业服务的会计审计、法律服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投资咨询、金融咨询、金融外包服务等业务。

2. 鼓励成长型企业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鼓励成长型企业参与航运产业发展，开展游轮（艇）经济、货物运输、船舶租赁、拖船作业等业务；参与现代航运服务业发展，开展航运融资、海损理算、航运交易、航运咨询、公证公估、航运保险经纪等业务；参与航运辅助服务业发展，开展码头服务、仓储服务、船舶代理、货运代理、报关服务、内陆运输服务、船舶供应服务、船员劳务中介等业务。

3. 鼓励成长型企业参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鼓励成长型企业参与商品货物流通相关产业发展，开展商品流通、批发、交易、口岸贸易等业务；参与商业购物相关产业发展，开展连锁经营、商务楼宇、商业零售等业务；参与贸易服务相关产业发展，开展商检、报关、理赔、会计、物流、会展服务、旅游经济、电子商务、采购中心及展贸平台建设等业务。

4. 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参与科创中心建设。发挥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创新能力强、运营机制灵活的优势，鼓励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聚焦重点项目，形成产业化基地；加强专业对接，鼓励成长型企业在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加快发展。

5. 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催生的新型业态。重点发展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宽带移动无线技术、电子商务、网络信息服务、网络游戏、数字出版等互联网产业；重点发展智能变电站、新能源接入系统等电力电子、电力储能系统、智能电表及家域网、高温超导、特高压输变电设备、IC和IT通信及软件等智能电网产业；重点发展芯片、传感器、识读设备、中间件、传输网络、应用服务等物联网产业；聚焦发展制造业专业服务、融资租赁、节能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聚焦发展嵌入式软件、工业软件等软件业和电信、广电等信息服务业；聚焦发展工业设计、时尚设计、软件动漫设计等时尚创意产业；聚焦发展世博科技在世博会后相关产业的应用。经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可申请享受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有关增值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动漫企业自主开发、生产动漫产品，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的，可按规定范围暂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6. 支持成长型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加强成长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成长型企业成为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依托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等载体，支持成长型企业技术创新，促进各类研发资源向成长型企业开放。帮助成长型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支持成长型企业承接科研成果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技术标准研发的良性互动，促进成长型企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大力推进成长型企业技术改造、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对纳入环境保护、节能节水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投资项目，按规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加强成长型企业标准体系建设，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培育标准化示范企业，鼓励并资助成长型企业承担制定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的项目。

(二) 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机制体制基础系统构建

1. 以融资服务为核心，完善金融服务支持体制机制体系。(1) 宏观层面。一是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的创新货币机制。从宏观货币政策出发，探索创新定向货币政策工具，在MLF等工具框架下，研究创设定向支持成长型企业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对成长型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效果。二是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的金融机制。结合自贸试验区“金改40条”相关措施，探索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服务对接支持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框架。依托境内和国际金融资源，服务上海成长型企业的发展。

(2) 中观层面。应结合“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发展战略，从上海金融市场建设入手，研究构建完善的直接融资市场，通过市场风险管理机制，帮助成长型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支持；同时丰富股权、债权融资渠道，引导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积极对接成长型企业融资需求，实现多种融资渠道的有效整合。一是结合“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的市场

机制。探索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创投市场、科技资源市场等市场资源整合。发展面向成长型企业的直接融资体系,通过试点面向成长型企业的产业投资基金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充分利用“新三板”平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孵化成长型成长型企业。二是结合“投贷联动”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壮大的投贷机制。加大投贷联动模式创新力度,利用“债转股”实现对科技企业贷款的风险抵补,完善信贷资产(债权)与股权资产(股权)的双向转换机制。

(3) 微观层面。研究建设体制机制丰富服务成长型企业的金融产品种类,提供完善的金融信息支持。一是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的产品机制体制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完善授信和评审标准和流程,构建支持商业金融机构、政策金融机构、监管机构针对不同特征成长型企业设立金融服务产品。二是探索支持上海成长型企业的信息服务机制体制创新。进一步鼓励完善成长型企业的信用档案,提高融资服务平台信息的质量,实现从动产登记、信息服务、信用增进的一体化动产融资服务体系构建。

2. 以财税支持为动力,构建上海成长型企业发展的机制体系。科学合理的财税支持机制体制,是成长型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非常重视财税体系对成长型企业的支持。在财政扶持方面,国家设立了各类成长型企业可以申请的专项发展资金,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支持的业务范围也逐步放宽。在税收优惠方面,国家继续对成长型企业进行所得税减免,企业从中获得大量实惠。截至2017年3月,我国针对创业就业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了77项税收优惠措施,尤其是2013年以来新出台的67项税收优惠,覆盖了成长型企业的全部范围。但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和上海的财税支持尚不完备,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有待提高,根本原因在于机制体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不足,机制体制的基础作用尚未完全得到发挥。

(1) 加大对成长型企业的财政津贴。一是对成长型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财政补贴,资金补贴能帮助实力较弱的成长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成长型企业财政补贴不能普及化,必须有目的地推进,重点是要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交易行为,支持有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的成长型企业,鼓励成长型企业搞创新科技研发。国家应规定将财政支出的一部分投入到成长型企业的科技创新中,实行就业补助和出口补助,鼓励成长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和产品出口。二是创建成长型企业发展基金,通过设立技术创新专项基金,制定成长型企业技术创新专项计划,对成长型企业的特殊时期采取更大力度的资金支持。三是财政贴息能解决成长型企业存在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应在单纯进行财政贴息和担保的基础上,增加以财政贴息的办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对成长型企业的贷款发放,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的放大效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成长型企业的资金需求,降低其发展的资金瓶颈约束。

(2) 完善成长型企业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完善成长型企业税收制度。规范对成长型企业的收费制度,清理不合理的收费,减轻成长型企业的经济负担,努力为成长型企业提供一个较好的税收环境。税收优惠是目前成长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优惠措施,虽然上海在营改增过程中,对成长型企业的各方面给予许多优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对成长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还很有限。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成长型企业因为营改增获得的税收优惠甚至因其在产业链的弱势地位而抵销,成长型企业的实际负担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因此必须研究成长型企业的税收优惠细则,可考虑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对成长型企业实行优惠“一税制”。此外,降低成长型企业的税负,还包括积极帮助成长型企业完善会计制度,重新划分小规模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率等;在税收政策方面向成长型企业适当倾斜,包括取消不合理收费、提高折旧率、减少税基等;适当调整所得税,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基、税率和税收减免政策,尽可能地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等;进一步完善个人投资的优惠措施和加强税收监管,在鼓励私人投资的同时,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逃税漏税行为,为成长型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成长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3) 对成长型企业制定采购计划。加大对成长型企业的政府采购力度,尤其是要在规范政府采购秩序的基础上,鼓励成长型企业积极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标活动。为保证政府公共采购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政府可制定一个明确的面向成长型企业采购量的标准,规定向成长型企业的采购量不得低于采购总量的一定百分比,并明确规定在产品和服务质量、价格等并无明显差别的情况下,政府的采购应适度优先向成长型企业倾斜。此外,政府财政还应加大对成长型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支持力度,为成长型企业的发展创新一个好的社会化服务支持环境。

3. 以信息服务为抓手,完善信息服务支持体制机制体系。针对上海量大面广的成长型企业群体,上海应不断拓展成长型企业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逐步完善成长型企业信息化社会服务体系,对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化工作进行分类指导与重点推进,提高上海成长型企业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和能力,促进成长型企业实现创新发展。

(1)不断强化电子政务面向成长型企业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是上海应不断加强政策法规信息引导,提高基础信息服务能力。完善成长型企业便捷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提高面向成长型企业的网上申报、许可、审批和招标采购等的效率,利用电子政务成果,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为成长型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二是拓展专门面向成长型企业的综合性、公益性网站建设。“上海市小企业”网应进一步拓展功能,加强为成长型企业服务的力度。主要表现在:扩大信息员队伍,充分报道市、区、行业、园区成长型企业工作与发展状况。三是增强支持成长型企业上市培育和展示宣传。开通网站多国语言版,向国际宣传具有“专、精、特、新”特点的成长型企业和品牌产品。构建APP等移动端服务项目。四是开展专业中介机构网上服务,推出会计、法律、管理中介等服务机构上网服务,增加网上网下互动。

(2)逐步完善成长型企业信息化社会服务体系。一是为成长型企业利用信息提供服务。上海应推进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扶持基础性信息资源平台建设,利用互联网、电话、期刊、报纸等形式,进一步搭建成成长型企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继续完善公共信息服务渠道,形成宽领域、多层次、多元化的信息服务体系。完善信息服务咨询范围。增强工商管理、税务管理、劳动保障、企业融资、技术创新、市场拓展、人力资源、法律知识等方面的政策或服务咨询的专业性。提升《上海成长型企业》信息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引导和支持各类服务机构开展公益性信息服务,做好信息服务咨询的支撑工作,使其成为成长型企业利用信息服务的坚强后盾。增强“上海市成长型企业专家咨询团”的规模,增加专题栏目、增多网上、热线电话和现场咨询、举办讲座场次。二是为成长型企业利用技术提供服务。提升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服务水平,在集聚服务资源、丰富服务手段、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机制等领域进行全面开拓,为成长型企业开展“专、精、特、新”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提供服务。

(3)对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化工作进行分类指导与重点推进。一是建设与优化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社会环境。完善信息技术服务政策体系,营造良好的企业信息化社会氛围,增强企业信息化决策的科学性,带动软硬件、咨询、服务等相关信息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全社会推进企业信息化的长效机制。二是规范和推广企业信息化示范园区或项目。上海应以扶持行业应用服务提供商(简称ASP)、设立企业信息化项目补助资金等为手段,从建设企业信息化示范园区或项目着手,大力推进企业信息化工作。利用产业集群中成长型企业高度集聚的优势,由信息化领先企业成批带动其他成长型企业实施信息化战略;利用骨干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成长型企业,形成产业链信息化的整体优势减轻成长型企业信息化投入负担,激发成长型企业信息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 以创业就业培训为内容,完善人力资源支持体制机制体系。(1)完善上海成长型企业人才培养措施。建立职业教育、产业发展、促进就业三者紧密结合的高技能劳动者培养制度。不断扩大上海校企合作培养范围,完善与学校专业匹配的技能培训及鉴定考核模式。

(2)不断强化并规范补贴成长型企业培训工作。继续推进职业培训补贴个人账户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技能培训补贴与促进就业相挂钩的机制。切实规范补贴培训运作,确保职业培训的质量。加强与区县的沟通和指导,做好补贴培训督导的专项业务培训。

(3)完善创业培训工作。提升上海劳动者创业能力,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结合上海创业培训工作实际,明确创业培训的相关范围、项目的申报认定范围、要求享受创业培训费用补贴的人员条件和补贴标准,以及创业培训的组织实施和管理要求。

(4)继续做好技能鉴定规范、职业技能竞赛及表彰等基础工作。夯实基础工作,拓宽高技能人才选拔渠道,加强职业技能鉴定的管理。继续做好职业技能竞赛活动,如组织开展市“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强化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系。在部分职业中试点实施国家职业资格鉴定高级考评员选拔聘任制度,加强考评员队伍的规范管理,同时,建立鉴定所(点)常态管理机制,明确鉴定所(点)的职责与义务。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制定管理办法,提高鉴定运作质量。

5. 以创新为驱动力,营造上海成长型企业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1)落实科技扶持成长型企业政策,支持成果转化。一是落实科技型成长型企业创新资金。国家成立了多个资助科技型成长型企业的创新基金,上海也相应设立了支持成长型企业创新基金,应切实将上述基金支持落到实处,帮助成长型企业孵化成长。丰富上述基金支持渠道,以全生命周期和投贷联动等方式资助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二是支持成果转化。《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17—2020)》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低门槛进入的扶持性政策。根据《行动方案》指引,上海应聚焦成长型企业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素功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主体、技术转移服务体系、科技成果信息库),生态环境营造(各类平台和网络体系建设)两条主线,重点解决高校院所、企业作为成果转化主体的创新能力问题,重点解决成果信息作为成果转化“种子”的共享利用,重点解决服务机构作为成果转化“桥梁”的能力问题,营造基于成果转化全链条、全要素,营造转化生态环境。

(2)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服务,全方位覆盖科技创新。提供综合服务,建立市、区多级小企业服务中心,为成长型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技术融资等专业服务,进一步完善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市技术交易所、市产权交易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使科技服务工作向区县、产业集聚区延伸,向小企业产业基地、园区深入。一方面将科技政策及时传递给企业,另一方面挖掘创新资金项目和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通过移植和完善技术、投融资、孵化、专家、中介等服务,使其成为新兴技术产业汇聚、风险资本汇聚、创新能力强大的创新创业园区。

(3)推动社会公益服务机构和科技中介引领成长型企业科技创新。通过国家、市、区三级公益服务机构引领科技创新服务。建立和完善专门的成长型企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社会公益性服务,宣传科技政策,引导和推进成长型企业专利、标准化、商标、品牌等工作。组织、举办成长型企业品牌论坛、企业家品牌研习沙龙、创名牌培育辅导、知识产权讲座、信息化培训等,推动成长型企业技术创新。除了国家、市、区三级公益性服务机构和各区成长型企业服务机构积极组织成长型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作外,也要注重专业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帮助企业做好技术创新工作。引导中介服务发挥特色服务作用,对企业进行专业的指导与服务。培育科技咨询机构帮助企业完成项目申报国家、市创新基金。培育科技中介提供专利、商标、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帮助成长型企业与世界接轨,排除海外不正当竞争,扩大海外市场份额等。

(4)依托产业集群完善创新技术服务平台。成长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迫切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平台服务,为其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特别是高科技成长型企业,需要平台提供的资格认证和技术服务,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教育、电子电器、机电仪表、化工、轻工、机械、生物医药、材料、环保、农林、食品等领域,应继续完善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向市内成长型企业开展检测认证服务,使成长型企业的检测要求逐步与国际接轨,提升企业突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的能力和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Beck T.,Demirguc- Kunt A.,Laeven L, et al. Finance,Firm Size,and Growth[J].Journal of Money Credit &Banking, 2008, 40(7).

[2]Berger A.N.,Saunders A.,Scalise J.M., et al.The effects of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small business lending 1[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8, 50(2).

[3]Choi C.,Rhee D.E.,Oh Y.Information and capital flows revisited:The Internet as a determinant of transactions in financial assets[J].Economic Modelling, 2014, 40(14).

[4]Peek J.,Rosengren E.S.,Boston F R B O.Small business credit availability:how important is size of lender?[J].Working Papers, 1995. [5]Stiglitz J.E.,Weiss 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

-
- [6] 蔡苓. 破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投贷联动”视角的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 2016(3).
- [7] 陈志强. 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匹配性[J]. 中国金融, 2017(13).
- [8] 何师元. “互联网+金融”新业态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度[J]. 改革, 2015(7).
- [9] 李涛, 徐翔, 孙硕. 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 社会科学文摘, 2016(4).
- [10] 李志赞. 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 2002(6).
- [11] 林毅夫, 李永军. 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J]. 经济研究, 2001(1).
- [12] 肖晶. 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地区制度环境差异化的研究[J]. 金融论坛, 2016(2).
- [13] 姚王信, 夏娟, 孙婷婷. 供应链金融视角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7, 34(4).
- [14] 张杰, 陈志远, 杨连星等. 中国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 理论与证据[J]. 经济研究, 2015(10).